

華人混血兒與 菲律賓民族的形成

陳守國作 吳文煥譯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出版

一九八九年八月廿八日

華人混血兒與 菲律賓民族的形成

陳守國作 吳文煥譯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出版

一九八九年八月廿八日

編者按

這是菲華歷史學家陳守國博士較重要及產生較重大影響的一篇論文（原文為英文）。這篇論文的初稿，曾於一九八二年交給譯者，譯成華文，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表在《世界日報》。初稿經作者二度修改後，曾於一九八四年由作者當時任教的菲大亞洲研究中心以油印本發行，隨後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錄在一本文集中，並印成單行本。本會兩年前曾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這個版本翻印一千冊，贈送菲政界、學術界、傳播媒介的人士和朋友，並於翌年由施華謹會友譯成菲文，發表在第四期的英文文藝季刊《橋》之上。現在出版的這個華文本，是根據一九八二年的譯文，對照經陳博士修改的最後文本加以修飾的。

陳守國博士的這篇論文，不但應該介紹給菲律賓朋友讀，以便讓他們了解華菲之間所存在的這種血肉相連的親密關係及我們華人通過華菲混血兒對菲律賓民族所作出的重大貢獻，而且我們華人自己也應該讀，有必要了解我們華人同菲律賓民族所存在的這種朋友加兄弟的親密關係，從而增進我們對菲律賓民族的了解和感情，更加熱愛菲律賓，把菲律賓當作是自己的祖國來看待。我們現在出版這個華文本，立意即在此。

陳守國博士其他有關菲律賓華人的主要歷史著作有：《菲律賓華人，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三五年，對他們的政治覺醒的研究》（一九七二年，陳守國畢業美國加州貝克萊大學的博士論文）和《日本佔領時期的菲律賓華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一九八一年），以及今年八月四日，本會為紀念他逝世一週年而出版華文譯本的《菲律賓五百年的反華歧視》（一九八八年二月）。

應予補充的是，假如陳守國博士如今還健在或他的這篇論文是在一九八六年二月以後才寫的話，他必定會在文中加上高拉順。許寰戈。亞謹諾總統，還有內閣和參眾兩院的許多高級官員。他文中曾提到的聖徒候選人羅仁樹。俞易斯，已於去年十月十八日宣了聖，成了菲律賓天主教的第一位聖徒，而益那舍修女，亦已被提名為第一位女聖徒的候選人。至於文中曾提到的大理院法官鄭建祥，亦應改為大理院首席法官了。

除非把華人混血兒對我們發展成爲一個民族的貢獻包含在內，作爲了解當代社會的根據的菲律賓有記載的歷史將是不完整的。

華人混血兒是十九世紀菲律賓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在菲律賓中產階段的形成、在鼓動改良、在一八九八年革命，以及在現在稱爲菲律賓民族的形成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當代，他們在國家建設中，繼續扮演着他們的角色。

血管中流着華人血統的非人在政府的最高層擔任重要的職位。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本國居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之一，後來成爲非自治政府的副總統，西希奧·奧斯敏迎是一位華人混血兒。美統時期，菲律賓國民議會花名冊的確確是一份華人混血兒的名單。有一些華人混血兒曾成爲總統：扶西·P·劉禮，依比趙·基仁諾，南文·墨獅獅和費迪蘭·E·馬可斯。其他在最近或現在任公職的包括西利·未拉沓總理、卡洛斯·羅武洛、羅伯道·王彬、亞杜洛·陳戈等部長，國糧署署長赫素斯·陳燦戈、國家圖書館主任西拉芬·紀亞遜博士和大理院法官鄭建祥。

其他在我們歷史上各種人類努力的領域中的著名人物都是或部份是華裔非人的後裔，或在父方或在母方。可舉出一些例子。在宗教方面，有益那舍·黎·依斯比里杜·仙道修女（菲律賓第一個婦女教會的創始人），羅仁樹·俞易斯神父（聖徒的候選人）和海棉·辛紅衣主教。在司法部門，有南文·亞典申那法官和大理院法官扶西·阿描·仙道斯。在教育領域，有未沓·陳（菲大校長）、趙多洛·M·加佬（教育家和歷史學家）、萬雷·林（教育部長）。在政壇上，有老尤洛希奧·羅里計斯（國民黨議員）和亞申紐·H·轆遜（馬尼拉市長）。在商業及慈善事業方面，有趙多洛·場戈。在軍職方面，有未申智·林將軍和西利·弗蘭道·巴沙將軍，兩者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在藝術方面，多瑪斯·彬彬，菲律賓第一位印刷者。

即使這些少數例子已足夠證明，在不同時期，華人混血兒對我國歷史曾產生巨大影響。然則，自相矛盾的是，華人混血兒在

菲律賓民族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没有受到我國學者的注意。只是在最近二十年內，才有像魏安國，赫素斯，未仁諾神父和約翰·舒馬赫這樣的人去鑽研華人混血兒對我國社會的貢獻。

華人混血兒在現在稱為菲律賓民族的創造及進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據赫素斯·未仁諾神父說：『菲律賓民族，不管在其主要的種族成份中多麼像馬來人；不管在其靈感、文明及宗教上多麼西班牙化和基督教化；不管在其政治、貿易及抱負上多麼美國化，曾歷史地和實際地，不是由華人移民，而是由華人混血兒所塑造的。』

着重談到華人混血兒對大社會的積極貢獻，範·費蘭道勉強地承認這樣的事實，即華人移民唯一的有益影響是『勤勞的華人混血兒種族。』

在殖民地的菲律賓被鑒定的兩種主要的混血兒中，西班牙混血兒和華人混血兒，後者被證明是菲律賓社會更重要的因素，原因有三：第一，華人混血兒人數較多，注入菲人身上的華人血統比任何其他血統多。在十九世紀中葉，有二十四萬華人混血兒，但卻只有七千至一萬的西班牙混血兒。第二，華人混血兒樂於同化進本地社會的組織中。第三，較之西班牙混血兒，他們在本國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生活中擔任更重要的角色。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他們的人數已那麼多，他們的影響是那麼大，以致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普遍使用的 MESTIZO（混血兒）一詞，通常就是指他們。

華人混血兒的演化

雖然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之前在本地定居的華人就已曾經同本地婦女通婚，但華人混血兒作為法律上一個獨特階層的出現，是隨着西班牙殖民統治才開始的。一五七一年，西班牙人建立馬尼拉市後不久，一個大的華人居民區發展起來了。從事作為商人，

工匠和家僕等多種服務。這些華人對首都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被鼓勵來及定居。華人口迅速增加。但西班牙人從這一迅速的增加所看到的只是對他們自己的統治的一種潛在威脅。他們擔心華人，作為一個根源在中國的種族，會比在整個殖民時代被西班牙人稱為土著（Indios）的基督教化的本地人更不忠于西班牙政權。

因此，西班牙人面臨一種窘境：他們需要華人在經濟中必不可少的服務，然則又對他們不斷增加的人數感到猜疑和擔心。不過，這種窘境却通過改變華人的宗教信仰及鼓勵華人天主教徒與土著天主教徒通婚的政策來加以解決。傳教士對完成這個目標作出了貢獻。神甫們在華人之間推行他們的感召，努力工作使他們改教。這為創立一個特殊的華人社區提供了根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五九四年建立的岷倫洛社區。

多明尼加教派積極地把這個地方變成一個結了婚的天主教徒的社區，到了一六〇〇年，它的人數已有五百多人。一六八七年Gremio De Chino（華人區公所）建立時，混血兒後裔以及華人居民都在同一個區公所登記。一七三八年，約有五千華人混血兒住在岷倫洛。

在其他地方，類似的華人混血兒社區也發展了起來。耶穌會也在仙查古律示區建立一個天主教華人的社區，它隨後產生它自己的混血兒社區。在敦洛村，華人混血兒以及土著受僵化的奧古斯丁教派看管。在十七世紀初期，怡朗約有一百個華人同本地婦女結婚。由於一六〇三年馬尼拉屠殺華人，許多華人逃至邦邦牙，並同當地婦女結婚。在十八世紀初期，宿務的八連主要是一個華人混血兒的社區。

在北呂宋，華人與低地的土著之間已有通婚，一五七四—一五七五年在凌牙鄰灣建立過一個短命的殖民地的林阿鳳遠征隊的殘餘則同高地的婦女，依戈律人和丁義安人通婚。依戈律人較淺的膚色和優美的體格，被許多作家歸因于華人的注入。指出這一點是十分有趣的。在蜂牙絲蘭省凌牙鄰社，即林阿鳳曾建立一個

短命王朝的地方有最多華人混血兒。在一七八七年，當地六千四百九十八人中，華人混血兒的人數達二千七百九十三人。許多華人同土著婦女的繼續通婚導致華人混血兒階層的增多。

隨着華人混血兒人口的增長，他們的法律地位的問題出現了。從西班牙開始佔領到大約一七四〇年，菲律賓的居民被分為三類：西班牙人，土著和華人。華人混血兒的法律地位終於在一七四一年解決。在那一年，全部人口因繳納稅賦而重新分為四類：免于付稅的西班牙人和西班牙混血兒；土著、華人混血兒和華人。他們都是須付稅的等級，雖然對每一等級徵收不同的款額。在十九世紀，土著付的稅賦或人頭稅等于一批索半；華人混血兒是第三批索；華人是六批索。隨着把華人混血兒列為一個法律上不同的等級，他們有了組成他們自己的 *Gremio de Mestizos Sangleyes*（華人混血兒區公所）的權利，並且不登記在土著的紀錄裏，且擁有自己的區長（*Gobernadorcillo*）。在有了二十五至三十位混血兒納稅人的村莊裏，他們組成自己的「描籠涯」。要不然，他們就附屬於最近的土著的「描籠涯」。

到了一八一〇年，在二百三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十六的土著人口中，有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個華人混血兒。在一八五〇年，華人混血兒的人口增至約二十四萬人，而土著的人口則增至四百萬以上。其中六個省份中，華人混血兒佔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以上。在另外六個省份中，他們佔當地居民的百分之五至十六。到了這個時候，華人血統的注入在所有社鎮都可以看到。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本國約有五百萬華人混血兒，大約四萬六千人住在馬尼拉。

任何由華人父親和土著母親生出的人被稱為華人混血兒。作為其結果的子孫被列為華人混血兒。一位嫁給華人或混血兒的混血女，以及他們的子女，皆登記為混血兒。但同土著結婚的華人混血兒，連同她的子女，則列為土著。

注意一下華人混血兒取得他的名字的方法是十分有趣的。這些方法曾由魏安國解釋過，但由本文詳細加以說明。

有時，混血兒保留其華人父親的名字，從許、陳、林、葉、王、黃等華人姓氏拼寫成菲人的姓氏。另一個方法是通過結合父親的全名的一部份創造一個菲人的名字。因此，當華人父親的全名是 Tee Han-kee 時，混血兒子女可決定創造一個新名字 Teehankee。這也說明原為華人姓名但後來被羅馬化的姓名的激增。諸如 Yuzon, Limkao, Limcauco, Leongson; 如果像 Yap Tin-chay 這樣的華人名字，已普遍地被叫做 Yap-tinco，把福建話（福建方言，多數的菲律賓華人是來自福建的）尊稱詞尾 KO（意謂「哥」）同他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叫，新的名字可能是 Yaptinco。這也說明為什麼今日有那麼多的菲人名字是以 co 結尾的；像 Sychangco, Angangco, Tantoco, Tanchanco, Tantuico, Tanlayco, Cojuangco, Syjuco, Ongsiako, Soliongco, Yupangco, Tanco, Yangco 等名字。雖然上述的名字使人想起混血兒孩子的祖先，天主教華人也在洗禮時獲得西班牙名字。赫素斯·未仁諾神父查看了十七世紀八連的三王教堂洗禮的紀錄，總結出這個有趣的發現。一個父母為中國人，在中國出生的三十六歲華人受洗為 Don Pedro de Mendiola，以他的教父 Don Pedro de Mediola 少校的名字命名。一六二七年五月十四日的名單顯示，Mateo Giang San 和 Ynes Lamanis 三週大的女兒洗禮後名為 Joanna Joanio，以她的教母 Maria Joanio 的姓氏為名。有時，華父菲母生的孩子是以菲母的名字命名的。一七〇〇年岷倫洛的一份名單顯示，一個九天大的男孩子受洗為 Hilario Camacho，是 Juan Ten Say 和 Maria Camacho 的嫡生孩子。

混血兒子係去掉其名字的華文部份而只用西班牙部份是很平常的。Jose Castro Ongchengco 的子係可能被稱為 Castro，或者，華人父親本人在取得一個新名字後可能謹以新名字來稱呼。因此，Mariano Velasco Chua Chengco，一個十九世紀後期的富商普遍地被稱為 Mariano Velasco。

另一個例子是 Antonio Osorio, 甲美地十三烈士之一 Francisco Osorio 的父親, 他原本的名字是 Tan Kim Ko • Juan de Vera, 『基督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 的印刷者, 他的華文名字音 Keng Yong •

如前所述, 在西統時期, 以教父母的名字來命名洗禮的華人混血兒是很普遍的。在十九世紀後期, 有些華人採用了不太常見的西班牙姓氏 Palanca。其中第一個使用這個姓氏的是陳謙善, 他是十九世紀後期『華人區公所』的區長。他從他的教父, 西班牙船民軍的 Carlos Palanca y Gutierrez 中校那裏獲得這個名字而成為 Carlos Palanca。後者反過來可成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富有釀酒廠陳迎來的教父, 他也取得 Don Carlos Palanca 之名, 現在著名的 Palanca 家族可能就是他的後裔。

西班牙或菲律賓的名字並不保證是西班牙人或菲人的後裔是很明顯的。一八八二年甲美地許多社鎮的『華人混血兒區公所』的華人混血兒名單顯示, 這些名字很難同本地人的名字相區別。下列的姓氏被列為『華人混血兒』: Tagle, Sabali, Dairet, Sanquilayan, Bautista, de Guzman, Villanueva, Camarce, Marimbao, Mayasa, Sarinas, Camua, Mateo, Carino, Aransasu, Tarim, Gianco, Topacio, Calocada, de Castro, Cuevas, Camerino, Tirona, Ylano, Marquez, Sarmiento, Sarreal, Sayoc, Samson, Madlansacay, Virata, Monzon, Malbal, Espiritu, Herrera, Alejandro, Yubienco, Bustamante, Poblete, Vasquez, Aguinaldo, Encarnacion, Legaspi, Jimenez, Sapica •

諸如 San Agustin, Basa, Feleteo, Jose, Fernandez, Ballesteros, de Cuenca, Lazaro, Miranda, Pagtachan, Narvaez, Javier, Estan-

dante. Lumanog. Alis. Madlansacay. Espeneli. Mojica. Pareja. Loyola. Villacarlos. Malimban. Alvarez. Salud. Poblete. Bustamante.

Nazareno 這些名字，也是華人混血兒的名字，他們從一八三〇年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擔任甲美地各社鎮的社長或區長。

一七九六年，新加西禮斯學院來自甘馬仁省和亞眉省的，被列為華人混血兒的學生，有以下被菲化或西班牙化的姓氏，如：Vicente Tagle. Narciso Cecillo. Bernardo de la Cruz. Vicente Racios. Juan Nepomuceno. Eulogio Modesto. Pablo de Santa Ana. Fabian de Vera 和 Jose Rodriguez。

在描戈律，在一份一八五二年描籠涯紀錄中，Cayetano. Villanueva. Balayos. Fereon. Segobia. Bringas. Lanes. Tomas. Rodrigazo. Arcenas. Medel. Gonzaga. Torello. Salmeo. Sta. Rita. Rodriguez. Guanzon. Puntuan. Suanson. Sianson. Togly. Asaola. Felicia. Picson. de la Pena. Brujola. Singco. Jocsing. Villamena. Quijano 這些西班牙化或菲化的名字，被列為華人混血兒。

在邦邦牙省描戈魯社，一七四六至一八二六年的混血兒區長名單中，可看到諸如 de Ocampo. Basillo. Mesina. de los Reyes 和 de los Angeles 等西班牙化的名字。在馬描拉葛社和墨西哥社，區長的名單顯示了西班牙化的華人混血兒，如 Pinping. Lusing. Tuazon 等。在紅奚禮示市，有 Henson. Dizon 和 Quiason 這樣的混血兒名字。

在黑人島和怡朗，有 Lacson. Conlu. Locsin. Jocson. Tionko. Yunpue. Tinsay. Yulo. Cuaycong. Montilla. Yusay. Lopez. Gonzaga. Yanzon. Guanco. Motelibano. Araneta. Ditching. Limsiaco. Magalona. de la Rama. Ledesma. Val-

derrama, Consing, Guanzon, de la Pena, Jison 等名字的家族，代表了該地區的華人混血兒階層。在宿務，Velez, Osmena 和 Climaco 家族來自華人混血兒家庭。在米骨區，二十世紀一些最重要的家族，出自十九世紀大家樂人——華人混血兒（Samson）和怡朗人——華人混血兒（Locsin）的移民。

如果現在有許多是出自華菲父母的非人不帶華人名字，這是因為非人和華人混血兒的名字被一八四九年的指令西班牙化了，這個指令要求每個家庭的家長從西班牙名字的目錄中選擇一個新的姓氏。

華人混血兒作為中產階級

十八世紀五十年代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華人混血兒作為企業家的發展，為菲律賓中產階級的出現鋪平了道路。繼承了他們華人祖先的經濟動力，約翰·鮑林形容他們「比士著更積極和有事業心，更謹慎和有開創精神，更適應于貿易和商業。」

因華人同一七六二——一七六四年佔領馬尼拉的英國人合作，有許多華人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後期被驅逐，以及禁止那些留在馬尼拉的華人到外省去，使精力充沛和有事業心的華人混血兒能打進華人獨佔的市場。

由於許多華商不在了，華人混血兒成了殖民當局、外國商行和馬尼拉居民的供應者。在首都，華人混血兒同華人分擔了作為進出口商、批發商、零售商及多數手工場的業主的經濟力量。在馬尼拉周圍的省份，他們實際上取代了華人，作為零售商。

到了十九世紀初，馬尼拉以南，特別是內湖省和巴西的華人混血兒經營了地產和批發業。馬尼拉以北，敦洛、馬拉汶、波洛、奧班道、未加瓦和武加威的華人混血兒，從事稻米種植，作

爲土地的承租人，以及馬尼拉與產米和鹽的邦邦牙——武六干地區之間貿易的中間人。馬尼拉以東，巴石的華人混血兒擅長於馬尼拉與內湖省之間的批發業及零售業。

在未獅耶，華人混血兒經營各島之間的貿易。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馬尼拉港的開放，接着是蘇亞港、怡朗港和宿務港，刺激了馬尼拉數島之間的沿海貿易。本區對外國貿易商的開放，促進了藍靛、糖、咖啡、椰子、菸草和大麻等熱帶作物向世界市場出口的增長。

馬尼拉同宿務和怡朗的摩洛及哈洛進行了有利可圖的島間貿易。從宿務，混血兒商人乘船到禮智、三描、加拉牙、密三密斯、黑人島和班乃，收購諸如菸草、海蜆、珠母、可可豆、椰油、咖啡、黃金、蜂蠟和稻米等當地產品。這些貨物被運到馬尼拉，在這裏，它們被賣給了華商和歐洲商人，然後載回製成品。在全未獅耶發售。

摩洛和哈洛的華人混血兒在未獅耶收購類似的項目向馬尼拉出口，和購買歐洲貨品到摩洛、哈洛及其他社鎮轉賣。摩洛和哈洛的混血兒也經營製造菠蘿絲布供出口。是這種茁壯成長的海岸間的貿易使宿務和怡朗富裕了起來。

華人混血兒在蕊描依絲夏和加干淵收購菸草，並把該產品轉運到馬尼拉。

對糖和其他熱帶產品的需求，鼓勵許多華人混血兒和土著商人開墾越來越多的土地。在邦邦牙、武六干、描沓安、描東岸、內湖、宿務、黑人島和怡朗，華人混血兒參與生產和推銷糖。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隨着馬尼拉港口開放，西班牙殖民當局鼓勵華人回到菲律賓以加速經濟的發展。華人的移民加速了，從一八四七年的六千人增至一八六五年的一萬八千人，一八七六年的三萬人，並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增至十萬人。這些新來的人湧至外省，開始取代華人混血兒作爲批發商和零售商。許多被取代的華人混血兒轉向種植出口作物和成爲地主。其他的轉爲諸如醫生、律師、作家或新聞工作者等專業人員，餘者轉向其他各種

職業。

菲律賓農業在十九世紀中葉從糧食作物轉為出口作物，見證了華人混血兒作為一個經濟上獨立的中產階級的上升。在馬尼拉和外省都是這樣。因此，雖然華人混血兒被逐出零售業，但他們却未失去其經濟收入的一切來源，或其社會地位。

這一在馬尼拉、怡朗、宿務和其他許多社鎮到處可見的富裕的商人階層，引起了菲律賓的外國考察者的注意。在一八四二年，施尼巴爾多·德·馬斯提到，繼承了其祖先的『勤勞及富有投機性精神』的華人混血兒，構成了菲律賓的『中產階級』。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在群島旅行的時候，約翰·鮑林把華人混血兒形容為『對純粹的馬來族土著的一大改進』，是菲律賓人口中最勤勞、最謹慎和最節儉的份子。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本國的費奧多·杰戈，把華人混血兒稱為『整個人口中最富有和最有事業心的部份』。許多當代的菲人企業家可從這些精力充沛的混血兒階層追溯他們的本源。說來湊巧，為了增加勤勞的華人混血兒的人口，西班牙人授予他們年國十六歲可不必家長同意而婚嫁的權利，一種不授予土著的權利。

中產階級上升為社會名流

華人混血兒的經濟財富對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和社會地位有很大作用。不願意接受過去的限制，這一中產階級的成員以新穎的藝術方式來表述他們自己。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在有錢人的屋中，豪華取代了僅僅的舒適。這個新的中產階級，往往是雅緻的及有教養的，仿效西班牙——歐洲文化的模式，牢固地在許多 Pueblos 或社鎮中樹立自己的地位。混血兒的房子的雅緻結構及雕刻精緻的傢器，顯示了他熟悉歐洲的生活方式。『在馬尼拉

四周的社鎮」，鮑林指出，幾乎每一個社鎮都有一些比餘者更大更好的住宅，主要是由有華人血統的混血種族居住。』他們取得的財富和他們花費它的方式，據魏安瑟說，使他們成為風尚、服裝和生活方式的主宰者。約翰·鮑林在一八五〇年寫道：『他們許多人採用歐洲服裝，但在他們穿本地服裝時，其品質較好，色彩較明亮，裝飾也較豐富。像本地人一樣，他們把他們的裙子穿在褲子上面，但襯衣是菠蘿絲或Sinamay做的，用有貴重鏈子的鈕扣扣住。男子一般戴歐式的帽子和穿長襪，兩性皆顯示了不小的時髦和風範。』

十年前，馬斯發表過這樣的意見：『他們（華人混血兒）比土著英俊，衣著更華麗更雅緻。其中一些婦女顯然是很漂亮的。不過，他們却保持土著的大部份習俗，勝過于他們對宗教任務的重視；因為他們比土著聰明。』

混血兒商人不只為社鎮提供製成品。他們還改變了因缺乏外部影響而孤立的社會生活，這個社會由於缺乏外部的刺激多年來變化不大。如今，商人帶來了刺激因素和新奇的東西。在怡朗觀察到同樣的現象，英國的副領事尼古拉斯·朗尼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寫道：『在過去幾年中，較大社鎮中的居民的服裝及一般外觀發生了一個十分顯著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取得這些物品的相對方便，這些東西以前不是不曾進口，就是其價格在當時是他們的能力所不能及的。在室內，從他們的傢器及其他佈置可看出同樣的變化，希望在家庭中的同一些用品加上裝飾也很明顯。』

中產階級的經濟重要性的上升有另一個重大的影響。取得一定數量的財富使一些混血兒家庭較容易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教育。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作為一八六三年教育法令的結果，一些人，多數是有錢的本地人和華人混血兒，有了到黎德蘭、仙扶西和聖道多瑪斯等學院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更多的家庭有能力送他們的孩子不只是到馬尼拉，而且是到西班牙，後來是到先進的歐洲國家，如法國、英國、奧地利

和德國去讀書。

在殖民時期，由於高等教育一直是富有家庭的特權，經濟及政治的領導也構成知識份子的精英。就數量上說，華人混血兒中產階級看來幾乎是微不足道的，但這些混血兒的教育成就，加上他們的經濟財富和社會聲望，使他們能夠支配輿論。一八七六年，W. G. 帕爾格雷夫評論道：「就知識上來說，他們一般比他們四周的沒混血的本地人優越。他們的成員，同全部人口比較並不大，但他們的財富和影響很大，要彌補這一不足綽綽有餘。」

不管他們的種族、社會及經濟來源怎樣，華人混血兒不但有支配本地經濟和社會的傾向，而且有支配當地社會的政治領導的傾向。在十九世紀末，外省村長或區長的名單中常常出現華人混血兒的名字，反映了華人混血兒相當大地同化於本地權貴的行列。

一八六一年，英國副領事在一份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說：「怡朗的混血兒，特別是那些有華人血統的，是一個顯著的商業、工業及富冒險精神的種族，其社會及政治的重要性年年增加。雖然不完全像華人那麼節儉及擁有在巨大競爭壓力下繼續取得成功所需的商業素質，並不是沒有預見、力量和事業心的，他們的努力，足以保證預期在培養方面取得相當的發展。」

指的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宿務上層權貴的聲譽和日益增長的影響，他們是由前八連權貴傳下來的三十至四十個華人混血兒家庭組成的，一個宿務的新聞工作者熱情地稱道：「我……愉快地回憶那些日子，當時的 Velez，Osmena，Climaco 及其他類似他們的家族，像最明亮的星星照耀着宿務的天空，他們更以其上層地位突出，他們的財富使他們列為上層，而這樣一來，他們受到他們自己及外國人的尊敬和欽佩。」

華人混血兒在形成菲民族中的作用

要考察華人混血兒在形成菲民族及民族建設中的貢獻，我們必須轉到十九世紀後半葉。

十足的自相矛盾，在取得財富的過程中，華人混血兒中產階級也停止作為西班牙的屈從臣民。他們已變得太富裕，從而太思想獨立了。有些社區的華人混血兒的人數已足以組成他們自己的華人混血兒區公所，且演化成爲一個法律上的不同階層。這導致一七四一年武里溜·未拉地神父抱怨說：『現在我們有了一群愛發牢騷的混血兒，他們能在社會中製造不和。』時間證明，這一預言是正確的。

到了十九世紀初，外省出現的華人混血兒中產階級開始左右輿論了。早在一八二七年，奧雷·伯那地斯·比沙洛已經觀察到土著和混血兒教士有『傾向革命的危險』。西班牙人對土著不感到什麼或全然沒有關係，却發覺他們受到華人混血兒的存在的威脅，華人混血兒被形容爲『對西班牙沒有同情心』和『很難屈服』。用魏安區的話說，西班牙人現在『老是害怕一場由混血兒領導的土著的革命。』這樣的擔心是有原因的。在一八四一年，施尼巴多·德·馬斯在一份給馬德里政府的秘密報告中，懷疑華人混血兒是一個有潛力的核心，在其周圍，可能組織起土著的叛變，並且預測有朝一日華人混血兒將控制輿論。他隨即建議，如果西班牙決定把菲律賓保持爲殖民地，必須發展『華人混血兒與土著之間的種族仇恨』，這兩個階級必須以『劍鋒隔離』，這樣才能使土著階級同混血兒階級永遠不會形成共同的群眾或公眾精神。土著階級『在數量上是強大的』，而混血兒階級則『通過其智慧、活動和財富。』